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李天纲
编

马相伯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李天纲
编

马相伯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马相伯卷/李天纲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7-300-19541-4

I. ①中… II. ①李…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②马相伯 (1840~1939) -思想评论 IV. ①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27616 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马相伯卷

李天纲 编

Ma Xiangbo J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张 38 插页 2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613 000

定 价 84.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 序

对于近代的理解，虽不见得所有人都是一致的，但总的说来，对于近代这个词所涵的基本意义，人们还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代，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领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是自成一体的，与外界的交往比较有限，其生产方式的代谢迟缓了一些。如果说，世界的近代是从17世纪开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则是从19世纪中期才开始的。现在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把1840年到1949年视为中国的近代。

中国的近代起始的标志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原来相对封闭的国门被拥有近代种种优势的英帝国以军舰、大炮再加上种种卑鄙的欺诈打开了。从此，中国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沦为半殖民地。原来独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如今独立已经极大地被限制，大一统也逐渐残缺不全，中央集权因列强的侵夺也不完全名实相符了。后来因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军政势力崛起，形成内轻外重的形势，也使中央集权被弱化。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多次内外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都无法顺利走上近代发展的轨道。古今之间，新旧之间，中外之间，混杂、矛盾、冲突。总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未能成为近代国家，更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外患内忧咄咄逼人，人们都有某种程度“国将不国”的忧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明理的士大夫，或今所谓知识分子，

尤为敏感，在空前的危机与挑战面前，皆思有所献替。于是发生种种救亡图存的思想与主张。有的从所能见及的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中借鉴某些东西，形成自己的改革方案；有的从历史回忆中拾取某些智慧，形成某种民族复兴的设想；有的则力图把西方的和中国所固有的一些东西加以调和或结合，形成某种救亡图强的主张。这些方案、设想、主张，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到“最落后的”，几乎样样都有。就提出这些方案、设想、主张者的初衷而言，绝大多数都含着几分救国的意愿。其先进与落后，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尽可充分讨论，但可不必过为诛心之论。显而易见，既然救国的问题最为紧迫，人们所心营目注者自然是种种与救国的方案直接相关的思想学说，而作为产生这些学说的更基础性的理论，及其他各种知识、思想，则关注者少。

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知识精英们参考世界上种种思想学说，加以研究、选择，认为其中比较适用的思想学说，拿来向国人宣传，并赢得一部分人的认可。于是互相推引，互相激励，更加发挥，演而成潮。在近代中国，曾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思想学说，或者够得上思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进化论。近代西方思想较早被引介到中国，而又发生绝大影响的，要属进化论。中国人逐渐相信，进化是宇宙之铁则，不进化就必遭淘汰。以此思想警醒国人，颇曾有助于振作民族精神。但随后不久，社会达尔文主义伴随而来，不免发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人们对进化的了解，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有时把进化理解为一条简单的直线。辩证法思想帮助人们形成内容更丰富和更加符合实际的发展观念，减少或避免片面性的进化观念的某些负面影响。

（二）民族主义。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最重“华夷之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大体仍是如此。后来渐渐认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但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追求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之第一义。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于是，渐渐形成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结束清朝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协约国”，第一次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接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两件事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绝大影响。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提升

到一个新的层次，即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发生紧密联系。也可以说，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如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用来应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糊的理想是早在古代就有的，而且不论东方和西方都曾有过。但作为近代思潮，它是于19世纪在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起初仍带有空想的性质，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起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播者不太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区别。有一部分人，明显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影响，更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人始较严格地引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但有一段时间，无政府主义仍是一股很大的思想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说，是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后，社会主义者，多次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者进行论争并不断克服种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四）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是从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只是信从者一直寥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的数量渐渐多起来，自由主义始渐渐形成一股思想潮流。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自己承担责任，在政治上反对一切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缺乏社会基础。在政治激烈动荡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很难凝聚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在稍稍平和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很大的作为。

（五）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旧的东西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新的东西也还未能巩固地树立起来，新旧冲突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凡助推新东西成长的，人们便视为进步的；凡帮助旧东西排斥新东西的，人们便视为保守的。其实，与保守主义对应的，应是进步主义；与顽固主义相对的则应是激进主义。不过在通常话语环境中人们不太严格加以区分。中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持续两千余年，旧东西积累异常丰富，社会转型极其不易。而世界的发展却进步甚速。中国的一部分精英分子往往特别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社会，总想找出最厉害的手段，选一条最捷近的路，以

最快的速度实现全盘改造。这类思想、主张及其采取的行动，皆属激进主义。在中共党史上，它表现为“左”倾或极左的机会主义。从极端的激进主义到极端的顽固主义，中间有着各种程度的进步与保守的流派。社会的稳定，或社会和平改革的成功，都依赖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中间力量。但因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一直未能成长到足够的程度。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以及激进主义与顽固主义，不断进行斗争，而实际所获进步不大。

（六）革命与和平改革。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运动与和平改革运动交替进行，有时又是平行发展。两者的宗旨都是为改变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有很长一个时期，有两种错误的观念，一是把革命理解为仅仅是指以暴力取得政权的行动，二是与此相关联，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改革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这两种论调既无理论根据，也不合历史实际。凡是有助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探索，无论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都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近代揭幕之时，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侵略与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是它们互相争夺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资源地。而这时的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末日，统治当局腐朽无能，对外不足以御侮，对内不足以言治，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能力均招致怀疑。革命运动与改革的呼声，以及自发的民变接连不断。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危机极端紧迫。先觉分子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于是西方几百年里相继风行的思想学说，在短时期内纷纷涌进中国。在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是这样，五四时期在较高的水准上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另一个是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在五四时期，都已有人觉察。我们现

在指出这些问题并非苛求前人，而是要引为教训。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姿态，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些论争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如兴洋务与反洋务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共和与立宪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旧伦理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社会史的论争，人权与约法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这些争论都不同程度地关联着一直影响甚至困扰着中国人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与心物关系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的光谱虽比较齐全，但各种思想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力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思想信从者多，言论著作亦多，且略成系统；有些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做过介绍或略加研究；有的还可能因种种原因，只存在私人载记中，当时未及面世。然这些思想，其中有很多并不因时间久远而失去其价值。因为就总的情况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的近代转型，所以先贤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整理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一则借以保存这份珍贵遗产，再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方便，三则为有心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便利。

考虑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上述诸特点，我们编辑本《文库》时，对于思想家不取太严格的界定，凡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有其独立思考、提出特别见解和主张者，都尽量收入。虽然其中有些主张与表述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为反映近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以供今人参考，我们亦保留其原貌。所以本《文库》实为“中国近代思想集成”。

本《文库》入选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在1840年至1949年之间的思想人物。但中共领袖人物，因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著述，本《文库》则未收入。

编辑如此规模的《文库》，对象范围的确定，材料的搜集，版本的比勘，体例的斟酌，在在皆非易事。限于我们的水平，容有瑕疵，敬请方家指正。

导 言^{*}

——“百年之子”马相伯

1876年，一位三十七岁的神父告别了孤寂的教会生活，离开了上海天主教耶稣会在徐家汇的住院，走进了正在蓬勃发展的上海洋场。这位神父一身儒雅，十分了得，当时已经精通法、英、拉丁、希腊、意大利文，后来在外交场合又学会了日文、朝鲜文。这位“下海”的神父，是天主教会培养出的江南才俊，实际上是被急需洋务人才的李鸿章用强硬手段从上海挖掘出来的。举目清朝十八行省，除了他的弟弟马建忠，很难找出第二个“精通七国语文”的人。李鸿章搞洋务，办外交，最需要这样“一以当十”的人才。从此，李鸿章的幕府人才库中，又多了一位全才人物，他就是和五口通商以后中国之命运相终始的马相伯。

马相伯（1840—1939），学名乾、良，一字建常，另字志德。他活了一百岁，被称为“人瑞”，实在是近现代中国的“百年之子”。1840年，马相伯诞生在江苏省镇江府丹徒县的一个天主教商人家庭，原籍是同府丹阳县的马家村。那一年，林则徐在广东禁烟，鸦片战争爆发。1939年，马相伯参与抗战，从上海辗转 to 越南凉山，在一座荒凉山洞里逝世。那一年，中国东部的大片疆土在日军的炮火中沦陷。按中国传统的纪岁方法，马相伯活了整整一百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百岁老人”，称得上是“人中之瑞”。但是，中国人在清朝的专制统治下，拖着辫子艰难曲折地走向世界，道途并不顺利。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中长寿，

^{*} 本文原为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拍摄《大师·马相伯》（2004）一片的策划稿，修改后作为本书导言。文中的引文和事迹未能一一附上注释和考订，具体细节可对照参看本书《马相伯年谱简编》。另外，还可在朱维铮主编，李天纲、陆永玲、廖梅编校的《马相伯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中核实和参看其他事实。

对本人来说并不全是一件幸事。马相伯常常不喜欢自己的高寿，自陈“寿则多辱”。1939年，抗战大后方的《中央日报》、《扫荡报》、《新华日报》用大幅版面为这位“人瑞”祝寿，历经沧桑的马相伯却自嘲地说：“我是一条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

拿破仑有一个著名预言，说中国是一头睡狮，醒来将震动世界。马相伯生活的一百年里，中国各方面发生了剧烈的变动，但是没有“苏醒”，更谈不上“振兴”。一百年里，变则变矣，巡抚、总督和皇帝不见了，代之以军阀、省长和大总统；县学、书院和翰林院不见了，代之以中学、大学和科学院；秀才、举人和进士不见了，代之以学士、硕士和博士……不断的社会运动，并没有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贫困、混乱、腐败、贪婪、不公正、不负责任的现象到处都是，中国仍然是一盘散沙。但是，“多难兴邦”，“乱世出英雄”，激荡的一百年里，中国出现了一大批仁人志士，他们担当起“振兴中华”的大任，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特立独行，艰难问学，最终卓然成家。

说实在，作为一个学者和思想家，马相伯的著述并不多。尽管后人编的《马相伯集》是厚厚的一本，但与他学富五车的中西学问相比，实在还是九牛一毛，而且系统性不够。作为学者，他留下的有系统的作品只有一部哲学教材《致知浅说》。1903年，他创办的震旦学院开学，即行编写了这部有关西方哲学的教材。从《致知浅说》来看，马相伯确实是20世纪初难得的一位真正理解哲学含义的中国人。他借用朱熹《大学章句集注》中对“致知”一词的定义来翻译“Philosophy”。“‘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殆即西庠所谓 Philosophia，译言‘爱智学’者欤？”按，Philosophy 的本义为“爱智慧”，明末李之藻翻译的《名理探》已经用了“爱知学”。清末外国传教士倾向于用“格致学”来对译 Science（科学）而不是 Philosophy（哲学），如英国传教士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 1822—1900）在《万国公报》上把培根的《新工具》翻译为《培根格致新机》，傅兰雅（John Fryer, 1839—1928）主编的《格致汇编》收入的是声光化电的新技术。马相伯受天主教耶稣会训练，并没有把科学和哲学完全分离，仍然把格致学广义地理解为哲学。或者说，把科学归入哲学，其只是格物致知的某种阶段，一种手段。马相伯对 Philosophy 的理解比较传统，具有天主教哲学的印记，但从今天科学主义思潮过后的哲学史观点来看，倒是比较全面，比较深入，因而也比较正确一些。

1851年，马相伯从家乡江苏丹徒来上海，先是投亲在他的姐夫朱家，当年就进入了上海天主教耶稣会刚刚创办的依纳爵公学。这所学校对外也称徐汇公学，后来就发展为有名的徐汇中学。此前，除了马六甲、澳门和香港有新教传教士举办的西式学校之外，中国内地的西式中等学校以徐汇公学为最早。按耶稣会的本土化策略，也鉴于当时中国文化的强大态势，徐汇公学给天主教会培养人才，就必须让中国孩子参加科举考试。因此，徐汇公学除了研习西学之外，也必须教授经学。马相伯在家乡已经发蒙，“四书五经”有些功底，便在那里带教其他学生。值得一提的是，他最亲近的老师，意大利耶稣会士晁德莅（Angelo Zottoli, 1826—1902）是一位汉学家。晁德莅精通中国经典，一生的功业就是把“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中的重要作品翻译成了一套拉丁文的《中国文化教程》（*Cursus Litteraturae Sinicae*, 1879—1883）。马相伯帮助晁德莅解读“四书五经”，晁德莅也教会了马相伯从欧洲学术传统来理解中国经典。这种跨文化的学问互动增进了师生间的友谊，他们两人是一生的朋友。马相伯之所以能够比其他学者更早地会通中西学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862年，马相伯升入徐家汇耶稣会神学院，成为修士，决心投身教会事业。经过二十余年的通商、传教，上海人已经注意到“坚船利炮”背后的西学。据后来的回忆，这一时期的马相伯和三弟马建忠仍然还在尝试举业，但真正的学问取向显然已经更加西化。法文、拉丁文、希腊文、意大利文已经打下基础，神学、哲学和科学方面的知识也是造诣不浅。据教会材料，徐家汇的耶稣会神学院办学水准相当高，课程水平达到巴黎的标准。上海徐汇公学和耶稣会神学院教授的欧洲哲学和科学知识，在远东没有第二家。马相伯的高水准西学，并非个案。他的同班同学李秋（问渔，1840—1911）神父后来在徐汇公学、震旦学院都担任科学、哲学教习，同光年间也做了大量西学研究、教授和传播工作，只是很不为外界了解。

1876年，马相伯在按立为神父之后，终于因为各种原因脱离了教会，离开了徐家汇，转而投身到淮军系统将官主持的洋务事业。先前，情同手足、合居一室的三弟马建忠已经于1874年脱离教会，加入李鸿章的幕府，并留学巴黎，一时看去前程远大。马相伯的学问兴趣，也在这几年里从神学和哲学，转向了天文学、几何学和力学等科学知识。马相伯刻苦钻研，到了夜不能寐、昼生幻觉的程度。同光中兴时期，科学

是新政的学问，可见马相伯的思凡之心已萌，经世之志已定。他决计步二哥马建勋和三弟的后尘，加入如日中天的淮军系统，充当幕僚。

在淮军系统当幕僚期间，马相伯到过神户、平壤，也去过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所有工作，就是写公文，办洋务，处理中外纠纷，推动新式事业，无须著述做学问。马相伯够得上大学问家和思想家的标准，他的长处在于能够从欧洲古典文明的脉络来理解西方的崛起，还能够从近代欧洲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不同经验看清朝的新政，这在当时虽不能说是绝无仅有，也是凤毛麟角。美国学者柯文（Paul Cohen）把马相伯与王韬、郑观应、马建忠、伍廷芳同列为“沿海型改革家”（Littoral Reformer），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按后来的教科书，把他们称“早期改良派”，思想较康有为、梁启超落后，则完全错误。他们是同光年间真正懂得世界事务，又对改革有切实主张的少数几个人。非常可惜的是，作为一个大学问家，马相伯这一时期留下的著述很少。作为一个重要的思想家，他出众的洞察力和广阔的世界观也没有得到应有发挥。类似马建忠《适可斋记言记行》的著述，马相伯只留下了寥寥数篇。1896年之前的作品，我们暂时还只见到方豪先生搜集到的《上朝鲜国王条陈》、《致朝鲜京畿道金宏集书》、《改革招商局建议》三篇。马相伯投入李鸿章及其他淮军将官幕府之后，和三弟马建忠一起经历过无数风浪，《中法新约》（1885）、《马关条约》（1896）、《辛丑条约》（1900）的签订都和两兄弟有关。1895年，马建忠将自己游记、日记、奏折、条陈、电稿、书信集中，刊印了《适可斋记言记行》，马相伯却没有留下自己的“记言记行”。

马相伯述而不作的个性，大概和耶稣会注重口头宣道，不鼓励著书立说的神父训练有关。但是，马相伯早期著作缺失的更重要原因，恐怕还在于天主教会与清朝士大夫社会悬隔太深，社会上不需要、不理解耶稣会的学问。同光年间，西方教会和中国社会之间还隔着一堵墙，马相伯的西学只能在教会研习，它的社会传播却被隔离了。上海是五口通商以后西学传播最充分的城市，但在19世纪70年代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之前，西学并不流行。英、美新教传教士的医疗、学校、出版、新闻等间接传教事业虽早就举办，但只是在戊戌前后才普及开来。所以，马相伯没有留下早期著作，和这样保守的大环境有直接关系。

1893年以后，马相伯连遭厄运。当年，他的妻子携襁褓中的幼子回山东娘家探亲，因海轮失事罹难；1895年，虔诚信教的母亲沈氏去

世前，对他离开教会深有责备；1896年，《马关条约》签订，马氏兄弟再次被“清流党”舆论指为汉奸。内忧外患，马相伯很是沮丧，终于决定在离开耶稣会二十余年以后，回到徐家汇，息影在土山湾孤儿工艺院老楼。这时候的马相伯，决心抛开红尘，一心著述。马相伯的归来，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中西隔阂这堵墙，他可以把西学传播到社会，也可以把外界对西学的需求引入教会。可惜，马相伯这样的著述开始得太晚！更有甚者，六十多岁的马相伯，不久又复出了！人在徐家汇，心在张园、福州路，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立宪、光复运动。辛亥革命以后，马相伯又北上参政，经年不归。种种活动令他不遑教课、写作，很遗憾没有留下更多的学术作品。

马相伯深厚的中西文化素养未能充分彰显，这是中国学术的重大缺憾。马相伯是一流学者，这一点既可以从《致知浅说》中看到，也可以他审定、刊印的《马氏文通》予以印证。学界对记在马建忠名下的《马氏文通》评价甚高，认定其是汉语言学的奠基之作。我们相信，马相伯是本书的作者之一，马氏兄弟的感情、经历、学问和思想，几乎完全一致。马相伯的学识，肯定不在他的弟弟之下。1904年，马建忠去世多年之后，马相伯整理、删定了《马氏文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马氏“难弟难兄”（王韬语）的学识，如当时学者承认的“严、马、辜、伍”（章太炎语）一样，均属于第一流。

原想避开红尘，避静，反省，著述，终老于此。然而，风动，幡动，终而心动，马相伯并不能逃离政治。无论是住在市区八仙桥附近的马家豪宅，还是躲在土山湾慈母堂附近的一座三层楼房，门前一直都有青年学生来叩门，向他求教西学。到八仙桥、徐家汇跟他学拉丁文，听他讲西学、洋务掌故，谈未来中国社会理想，这是从戊戌到辛亥，乃至抗战前上海学界的时髦。包括梁启超、蔡元培、于右任、王造时、史良在内，连续有几代人向马相伯执弟子礼，拜这位老人为师。1901年，蔡元培主持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师范特班，带领全班24名学生，天天到徐家汇向马相伯学拉丁文。清晨五点，蔡元培带着学生从公学步行来到土山湾，等候马相伯醒来，做完晨祷，跟着老人的口型练习外文。无论寒暑，毕恭毕敬，当得上程门立雪的故事。这批学生中，有后来彪炳中国文化史册的黄炎培、胡敦复、胡仁源、李叔同、谢无量、于右任、邵力子等。为了传授拉丁文，马相伯编写了《拉丁文通》，该书应该就是中国第一本通行的拉丁文教材。

1898年春天，康有为、梁启超骤得光绪皇帝的信任，6月11日发布定国是诏，开始了百日维新。曾经在上海跟马相伯学习拉丁文的梁启超，从北京急电徐家汇，邀请已经退隐的马相伯出山主持议定了的译学馆。马相伯搭架子，以年老为由不愿北上，要求把译学馆迁来上海，与徐家汇的耶稣会合作，两人在书信往返地商议着。梁启超还向光绪皇帝推荐这位奇才主持全国教育、科学、文化领域的新学科建设。因为百日维新的夭折，这些事业没有成功，否则马相伯就是第一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了。1907年，梁启超在日本东京筹办立宪团体政闻社，特请马相伯前往担任总务员，主持社政。清末民初，严复是西学大师，章太炎是国学大师，这两位学界泰斗，都尊敬马相伯的中西学识。章太炎是革命文豪，谈起西学，他只佩服“严、马、辜、伍”四个人。“严”是严复，“马”就是马相伯，“辜”是辜鸿铭，“伍”是伍廷芳。马相伯是西学大师，戊戌变法前后，梁启超办《时务报》（1896），张元济办商务印书馆（1907），都曾到市区马寓，甚至驱车到徐家汇，追随马相伯的西学。

六十岁之前，马相伯把自己的才智贡献给了清朝。为了一个扶不起的清朝，马相伯贴进去二十多载的壮年生涯。1900年天下大乱的时候，马相伯已经不在旋涡中心。1893年，在轮船招商局的一场海难中他丧妻失子。1895年，母亲沈氏去世前，责备他没有当个好神父。再一年后，因参与《马关条约》谈判，马氏兄弟身受铺天盖地的“汉奸”骂名。清朝的前途和自己的命运，都令马相伯失望。正是这时期，他决定退回上海，息影徐家汇。他的弟弟马建忠则卷入太深，签订《辛丑条约》的时候，又被李鸿章找去，和八国联军代表没日没夜地谈判。陷在翻译不完的英、法、德、俄、意、日文的谈判文件堆中，累死在案桌前。甲午战争前，朝鲜危亡。李鸿章曾对马相伯说：“大清国我都不敢保他有二十年的寿命，何况高丽？”清朝从内里腐败掉了，快要灭亡，李鸿章、马建忠、马相伯这样参与机密的官员看得最清楚。六十岁以后，马相伯决计离开官场，为中国的年轻人，为民族的新文化作一点贡献。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对于古代君主来说，祭祀（宗教）和军事是根本大事，强大的军队，宏大的宗庙，是王朝强盛和繁荣的象征。但是，中国要走出专制制度，步入文明社会，需要王朝之外的公共领域。对于19、20世纪中国的孔急之事，开辟、继承和传播现代知识的学术机构——大学才是最为重要的。大学是民族之魂，国家之本。现代社会的基础是文化和教育，而不是宗教和军事。没有大学的引导，中国走不

出传统的王朝社会。在传统的私塾、书院和县学里，背“四书”，查“五经”，不学外语，不读数、理、化，国家没有出路。更重要的是，没有大学，不培养专业精神，不鼓励独立人格，青年人蒙昧，成年人颟顸，老年人固执，正在把这个传统文化深厚的民族拖入深渊。大学之道，是使中国摆脱困境的正途。老马识途的马相伯，是最早认识这一点的中国人。

中国最早的新式高等教育，起源于基督教传教士举办的教会学校。1903年，马相伯决心创办自己的大学时，他的周围已经有了几所私立学校。1879年，美国圣公会从本国募来巨款，在上海创办了圣约翰书院。1901年，美国循道会传教士合并了几所中等学校，在苏州创办东吴大学。此外，在北京、武汉、杭州、长沙等地都陆续出现了一些教会学校。另一方面，面临崩盘的清朝政府为了挽救局势，不得不在甲午战败后创办新式高等教育。1895年，由李鸿章策划，盛宣怀筹办了天津北洋大学堂；1896年，盛宣怀又筹建了上海南洋公学；1898年，为了落实维新条例，朝廷创办了京师大学堂。这些学校，虽只能传习一些简单的英、法、俄、日文和零星的声光化电知识，程度不高，但已经算是最早的国立大学了。

举办新式高等教育是国家大事，理应由政府来推动。但是，从官场上退出来的马相伯深知朝廷做事，十九不成功。历次挫折，使他对清朝早已失望，便决心以一己之力创办大学。马相伯要办一所以欧洲为样板的私立大学。搞实业赚钱，办学校烧钱，办大学需要的大笔资金哪里来？中外人士目睹了一场令人惊诧的豪举：1900年8月25日，即“光绪庚子又八月一日”，马相伯立下了《捐献家产兴学字据》，把自己名下的财产全部献了出来，作为办学基金，“愿将名下分得遗产，悉数献于江南司教日后所开中西大学堂，专为资助英俊子弟资斧所不及……”这笔财产不是小数目，它们是位于松江、青浦等地的三千亩良田，上海法租界的十几亩地产，还有其他不少零星的工商业资产。用这些基金，办一所私立大学绰绰有余。马相伯是震旦学院的出资人，复旦公学的筹款人，也是两校的首任校长，称他为“震旦之父”、“复旦之父”恰如其分。马相伯一本淡泊名利的教友性格，没有留下多少与二校相关的材料作为自己的荣耀。除了捐献字据之外，我们只搜集到1905年震旦学院、复旦公学分裂之际发表在报纸上的《前震旦学院全体干事中国教员全体学生公白》和《复旦公学章程》两份资料。此外，马相伯在北京参与了

辅仁大学的筹建，也有不少捐助，还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对这些他都寡淡视之，只在别人保留的书信中偶尔提及，自己并不炫耀。

马相伯是一介书生，两袖清风。当修士和神父的时候，穿圣袍，吃食堂，手不摸钞票。“下海”后虽然给李鸿章当幕僚，参与洋务，却从来不掌管经济实权。马相伯富家子、士大夫和出家人的洒脱性格，使其视金钱如粪土，无心为自己私蓄财富。他晚年得到了巨额财富，但全不是他自己赚来的。财富来自家族，来自他大哥和大姐继承的另一种善贾家风。马氏兄弟中，二哥马建勋从太平天国动乱时期起就给李鸿章的淮军采办军火、粮草，是淮军的“粮台”。战乱期间，马家在上海八仙桥地区开商号，财富不下于在杭州为左宗棠“粮台”的胡雪岩。大姐嫁给了董家渡朱家，马相伯的外甥朱志尧，是上海最大的民营机器业求新造船厂的老板，担任过上海总商会会长。马家、朱家为同光时期上海商界翘楚。二哥去世后，没有子嗣，全部财产都分给了二位弟弟。马氏兄弟是上海骄子，在官场，马家兄弟是淮军的智囊，深与朝廷机密；在商场，马家是上海开埠后少有的成功者，富甲一方；在学界，马相伯、马建忠是公认的人才，在外语、西学方面罕有匹敌。马相伯完全可以留在政界、商界，充分享受权力和金钱带来的世俗快乐。但是，就在人人都为财富奔忙，个个都嫌收入太少的上海，马相伯拿出巨额的财富，抛却洋场的繁华，毁家兴学，重归教会。

马相伯是“裸捐”，财产捐光后，他留下儿子马君远在法租界独立生活，自己只身回到徐家汇，重过隐修生活。息影徐家汇的时候，马相伯开始翻译《圣经》。天主教会对于《圣经》翻译比较谨慎，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白日升（Jean Basset，1645—1715）曾翻译过一部《四史攸编》，耶稣会士贺清泰（Louis de Poirot，1735—1814）也曾有过一部《古新圣经》，但是都没有公开出版，只供神父自己参考用。20世纪中，罗马教廷对《圣经》的翻译逐渐放松，马相伯带着为中断教会生活二十多年的赎罪心理，决心以他的中西学识来完成这项事业。从1897年开始，历时十数年，他翻译的《新史合编直讲》终于在1913年由上海土山湾印书馆印行。无论如何，这是第一部由中国人翻译，而且出版了的中文《圣经》。马相伯忠诚于天主教会，这是无疑的。1897年，他撰写了《利玛窦遗像题词》、《徐光启遗像题词》、《汤若望遗像题词》、《南怀仁遗像题词》。1915年，土山湾孤儿工艺院用上述题词，创作了中国天主教四大重要人物画像，参加了旧金山巴拿马世界博览会，现今真迹仍存